



女权、启蒙与民族 国家话语

Feminism, Enlightenment and Discourses of
State-Nation

刘慧英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女权、启蒙与民族 国家话语

Feminism, Enlightenment and Discourses of
State-Nation

刘慧英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刘慧英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09573-5

I. ①女… II. ①刘… III. ①女权运动—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①
D4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2845号

责任编辑 陈建宾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6千字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 插页3
版 次 2013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73-5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2年3月

目 录

插图索引	1
第 1 章 绪论	1
1.1 本课题的相关研究	1
1.1.1 女性史框架内的开山之作	1
1.1.2 “妇女运动史”框架内的历史叙述和文献资料积累	3
1.1.3 1980 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	5
1.1.4 妇女与民族国家关系的研究	12
1.2 对“女权”和“启蒙”的界定	18
第 2 章 富国强民——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的话语建构	22
2.1 从“分利者”到“国民母” ——“男性女权先声”对现代女性的界定和塑造	22
2.1.1 “生利说”的来源及衍生于妇女问题	23
2.1.2 现代意义上的贤妻良母	35
2.2 富有中国特色的女权及启蒙	48
第 3 章 女权启蒙的急功近利性	57
3.1 妇女 ——被民族国家话语任意编织的“场所”	57
3.2 集结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下:为民族国家的利益竭尽全力是 女性存在的最高价值	62
3.3 前现代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关注与女权启蒙的比较	70
第 4 章 女权启蒙中塑造的救国女子形象	78
4.1 小说作为拯救民族国家的工具 ——从“改良群治”到宣扬“女子救国”论	78
4.2 女子以姿色为救国之手段——女子的“历史”使命?	87
4.3 向中国妇女推荐的西方“时髦”女性形象	93

第5章 反民族国家的话语的崛起	
——无政府女权主义的历史意义	100
5.1 男女平等:如何可能以及如何不可能	100
5.1.1 全面平等的基本立场	
——无政府主义对妇女问题的关注	100
5.1.2 无政府主义反民族国家立场对女权启蒙的矫正	107
5.1.3 与民族国家话语的缠绕和混淆	112
5.2 从女权主义到无政府主义	
——关于何震和《天义》	116
5.2.1《天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女权主义?	117
5.2.2 被淹没的或尚待挖掘的历史	127
5.2.3 对平等的追问:何震与某些无政府女权主义者的差别	136
第6章 女性在“五四”进入主流话语的某些面向	141
6.1 被遮蔽的妇女浮出历史叙述	
——简述初期的《妇女杂志》	143
6.1.1 独立的品格	144
6.1.2 最初的两任主编	146
6.1.3 文体和主题	152
6.1.4 对“分利说”的颠覆	159
6.1.5“保守”还是“进步”	163
6.2 章锡琛时期的《妇女杂志》	167
6.2.1 继《新青年》之后的又一个反传统的重要阵地	167
6.2.2“五四”时期《妇女杂志》新老交替的背景	174
6.2.3 妇女问题的“核心”——自由恋爱?	178
6.2.4 以男性为本位的“妇女主义”	185
〔附录〕《妇女杂志》第一卷各期封面	193
第7章 结论	195
参考文献	205
后记	215

插图索引

青年时代的梁启超	25
《生利分利之别》铅印本封面	27
严复	30
《新民丛报》创刊号封面	33
北京内城女学传习所	36
1930 年代初学生们表演的 1881 年时圣玛利亚女校学生上课情形	43
日本小学校课堂	44
留学日本实践女校的中国女学生与校长下田歌子及教师们合影	45
“比利士妇女赴战地服务行经伦敦街市之状”	48
20 世纪初留美中国女学生	52
1915 年 10 月 23 日美国妇女纽约游行	53
“欧洲女界在大战中之运动”	55
珊格夫人	67
《节制》月刊封面	68
山额夫人来华与欢迎者合影	69
《新小说》杂志封面	79
《女狱花》封面	84
《女狱花》作者王妙如	85
《闺中剑》封面	86
《女娲石》封面	88
“法国三女杰”图	94
“看护妇南的耨耳绘影”	96
俄国虚无党女英雄苏菲亚像	98
《天义报》及《天义》封面	101
《新世纪》	102
《新世纪》创办人李石曾	109

何震与刘师培等人合影	119
《中国新女界杂志》封面	121
法国女杰露依斯米索尔像	125
蔡元培	128
爱国女校春季运动会中之哑铃操	129
爱国女校学生表演土风舞	130
《女子世界》封面	133
署名为何震所绘的女娲像	135
《妇女杂志》创刊号封面	145
王蕴章	147
胡彬夏	150
金一所著《女界钟》初版本封面	155
金一创办的苏州同里明华女校学生合影	156
上海爱国女学学生水彩画作业	159
《青年杂志》(《新青年》)封面	168
《新青年》第一个女性作者李张绍南	171
1920 年代的茅盾	175
章锡琛	176
周建人	177
爱伦凯	190
《妇女杂志》第一卷各期封面	193

第1章 绪 论

1.1 本课题的相关研究

如果要以现存的学科分类来界定本著的研究范围,它可能会被划分为一种交叉学科的研究:文学文本解读、女性史研究以及民族国家想象等等,但这并非是一种个人的“自创”,事实上,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引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以及所谓的“女性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就拉开了帷幕,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和深化,一些研究者从纯文学批评和研究转向了文学与历史以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相结合的研究,也有称其为跨学科研究。

1.1.1 女性史框架内的开山之作

虽然对主流学界来说,女性史乃至女性文学是一个相当边缘乃至不成规模甚至缺乏规范的学科领域,但是它从发生到发展至今却有着一个清晰的脉络。如果要追溯中国现代以来对妇女文学和历史的研究,那么毫无疑问“五四”前后一些男性文人的叙述占有主导地位。就像本著将要论述的中国女权启蒙一样,有关中国妇女的历史叙述似乎都源自于男性,如果要梳理这一脉络或“谱系”(假设这是一个规范的学科或有一个自成规模的谱系的话),那么谢无量编《中国妇女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9月)、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11月)、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陶秋英《中国妇女与文学》(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徐天啸编辑《神州女子新史正续编》(上海,神州图书局,1913年)、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1月)等等出版于1910—1930年代的妇女文学史和生活史著述则毫无疑问地是这一学科的“开山之作”。在此之前,从来无人正面为妇女的文学成就(当然也包括

作为一个群体的妇女)作史。这些开山之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是一种现代女性观的产生和形成的标志,就如谢无量 and 谭正璧所宣布的:“夫男女先天之地位,既无有不同,心智之本体,亦无有不同,则凡百事之才能,女子何遽不若男子。即以文学而论,女子固亦可与男子争胜,然自来文章之盛,女子终不逮于男子者,莫不由境遇之差,有以致之。考诸吾国之历史,惟周代略有女学,则女子文学,较优于余代,此后女学衰废,惟荐绅有力者,或偶教其子女,使有文学之才,要之超奇不群者,盖亦仅矣。今世女学稍稍为教育界所注意,使益进其劝厉之方,加以岁月,自不难与欧美相媲,男女终可渐几于同等,非特文学一事而已。”^①“女性地位之羸弱,自古云然。社会学家知其意,乃有研究女性问题之创,解放之声,亦随之以起。夫女性而成问题,女性之不幸也;为男性者,当本‘同为人类,悲乐与共’之旨而扶掖之,赞勉之。”^②

在前现代虽然也有少数男性文人将“闺秀”或青楼女子的诗词编订成册,但多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无论是闺秀还是青楼女子的写作都很难进入正统文学史框架。从20世纪初开始的女权启蒙思潮为女性进入历史叙述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准备,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的诞生,更是为开创这一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不可低估的条件。上述提到的多部著述均作于1920年代或1930年代初,这直接与妇女解放思潮的高涨有关。然而,这些现代早期的妇女文学史或生活史著述虽然已初步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意识或扶持作为弱势的女性群体的意识,但在具体的论述框架方面一般都是按传统的断代方式来划分妇女文学史或女性生活史的历史阶段,大都从上古一直叙述到“近世”(对“近世”的概念不太一致,有的指“宋辽元明”,有的则指“明清”两代,有的则将辛亥之后或“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包含在“近世”之内);大部分的妇女文学史著述“主辞赋,述诗词,不以小说戏曲弹词为文学”,但也有“从汉晋诗赋、六朝乐府、隋唐五代诗人、两宋词人、明清曲家、通俗小说与弹词”^③来梳理历代的女性写作。

从著述的数量对比中即能看出,中国现代的女性史研究主要是从妇女文学史起步从而形成一定的规模。1930年代其他的女性史研究也呈现出紧随其后的态势,比如: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陶希圣的《婚姻与家族》(上海,商务印书

① 谢无量编:《中国妇女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9月,2页。

② 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自序》,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11月。

③ 同上。

馆,1934年)、陈顾远的《中国婚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等,这些著述在出版时间上都相应地滞后于妇女文学史著作,且数量上也相对地稀少一些。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陈东原所著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它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女性史著述,而且是“五四”前后女性史著述中唯一一部全面记述中国历代女性历史的著述。它的基本历史观建立在20世纪影响巨大的“进化论”的前提之下,而且深受“五四”新文化启蒙思潮的浸染和影响,将中国三千年的历史看作女性备受摧残压迫的黑暗而漫长的时代,这受到了后来的女性史研究专家的批评和指责。^①

1.1.2 “妇女运动史”框架内的历史叙述和文献资料积累

由于“妇女运动”在现代中国的发生,一些置身其中的人以及并非置身其中却热切关注者则成为描述这一历史现象的作者。1930年代,在经过了20世纪初的女权启蒙热潮及“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浪潮的洗礼之后,某些妇女运动的亲历者开始著述自己的妇女运动史,刘王立明所著《中国妇女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6月)、谈社英编著《中国妇女运动通史》(南京,妇女共鸣社,1936年)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毋庸讳言,“妇女运动史”的叙述从一开始就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尤其是作者本身即这一运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她们与各种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与组织者一样无可避免地带有她/他所属的社会阶层或集团的立场和态度,并将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带进对历史的叙述里,甚至影响到对历史事实的筛选和过滤。这种倾向到1949年以后的妇女运动史叙述中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妇女运动史”几乎成为中共党史的一个“分支”。1980年代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对“妇女学”或性别研究学科的影响,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在批评话语层面相继发生变化,“妇女运动史”领域则从“真实”叙述历史材料起步,然而由于几十年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地位,这一领域似乎有些积重难返,突破性的成果并不多。

也许正是因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高度控制,正面叙述历史的可能性变得非常之小,而资料汇编则相对可以透过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缝隙得以面世,同时又不失其历史真实性。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在官方意识形态控制

^① 参见[美]高彦颐(Dorothy Ko):《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2页;[美]伊沛霞(Patricia Ebrey):《内闾: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胡志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7页。

最严的1950—1960年代也依然存在这种可能性,例如,张枬、王忍之所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全五册)(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1月)。在这部资料汇编里,虽然历史叙述的主体框架是“政论”或“思想史”,但其中却也包含了不少有关鼓吹女权或涉及妇女问题的篇幅及线索,其中选择了有一定代表性的妇女刊物:《女子世界》、《中国新女界杂志》、《中国女报》、《天义》、《女报》、《留日女学会杂志》等,同时还选择了一些非妇女刊物中有关妇女和家庭讨论的篇幅。这种资料上的整理和积累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为1970—1980年代乃至本世纪的中国女性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性平台和一些基本历史线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以后的台湾历史学界由于处于一种与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操控中,相对大陆的女性史研究他们在材料上领先了一步。台湾的女性史研究基本是在1970年代有了一个较为“繁荣”的局面,其中,李又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是一部重要而可贵的女性史文献文本。这部长达一千多页的文献资料汇编相当全面地含括了中国近代出于不同背景和不同立场倡言“女权”或提出妇女问题的言论,它为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众多的线索及可能性,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历史叙述中女性史依附于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大叙事的框架,而在资料和文献层面上首次以“女性”或“女权”作为主题和主体。美中不足的是,它很可能是为某种意识形态观念所限^①,文献材料的选择绝对地以1911年作为下限,而将1911年之后,尤其是将1915年以后新文化运动中有关妇女问题的大量历史文献统统排除在外,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民国初期,尤其是“五四”的妇女解放与晚清的“女权运动”割裂开来,从而导致对这一历史脉络的认知不清。在此还需指出一点,在1949年以后的台湾官方意识形态掌控中的历史研究对“五四”以后倾向中共的言论和人物都颇有讳言和禁忌,这加剧了“五四”历史叙述支离破碎的严重性。作为一部完整的“女权运动”文献集它多少给人留下了一点遗憾。台湾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女性史的研究之所以较大陆领先一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类似的资料工作做得较为潜心和扎实。

相隔仅五年时间,由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选编的《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出版,如果说李又宁、张玉法的选编在时限上有意识形态阴影,那么,《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在时限、文献及作者的选择上都停留在

^① 所谓“意识形态观念”很可能来自: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为“现代”的起始,这之前被称作“近代”。

1949年以后官方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层面,将“五四”看作一个完全崭新的、与以往时段完全割裂的历史阶段,而且被选编的文本基本上出自官方所认可的“五四”“主流”期刊:《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新妇女》以及1920年以后的《妇女杂志》;就文献的作者而言,大多数是倾向马克思主义者或索性就是共产党人,唯一的对立面可能就是胡适,回避、过滤和排斥了不少在官方意识形态看来是对立面或非主流的声音和人物。这充分反映了1949年以后官方意识形态对女性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或曰“现代”)历史的表述。

倒是一些非女性史资料选集中偶然穿插选择了一些通常不太容易见到的文献,比如,1980年代出版的蔡尚思主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①中曾选编了刘仁航《世界女性政府泰平实现方略》以及潘光旦《优生的出路》、张竞生《美的社会组织法》的部分篇幅,当然后两者现在已出版了作者文集,早已经不是难以寻找的文献,但在1980年代确是弥足珍贵的资料线索。这些篇幅虽然在1949年之后几乎完全被屏蔽,但却是“五四”时代的主流话语,如果这样的主流话语对我们都是“盲点”的话,那我们还怎么面对“五四”历史遗产?之所以在此花费如此多的笔墨来谈论资料问题,是因为我们深感女性史研究除了性别障碍外,在基本文献史料方面则更多地受到几十年来所形成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当它在1980年代起步时首先面临的是基本材料的收集难题,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

1.1.3 198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

1930年代以后由于战争(后来又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原因,女性史研究几乎趋于完全停滞的状态,直至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作为一门学科又逐渐获得新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出版于1980—1990年代、由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中的多部妇女史以及妇女运动史著述较为难能可贵,这些著述有:杜芳琴著《女性观念的衍变》(1988年10月),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1989年7月),吕美颐、郑永福合著《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1990年7月),闵冬潮著《国际妇女运动——1789—1989》(1991年11月)。杜芳琴的书主要是梳理中国古代社会自三皇五帝直至儒释道诸家的妇女观,作者古代史专业知识扎实丰富,叙述脉络清晰,它对1980年代以后的古代女性史研究做了一种开拓性工作。相对于古代女性史研究,现代女性史或妇女文学史似乎在

^①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全五卷),蔡尚思主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1983年。

一个更缺乏学术规范、更为荒芜的领域内进行,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近现代史面临着更为艰难的资料寻找和选择的局面,也面临着更多的话语限定和意识形态压力,但同时又具有更多的开拓空间。后面两部妇女运动史著述虽然出版于1990年代初,但它们的写作,尤其是资料的选择和整理基本都成形于1980年代,从这两本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一方面要竭力寻找更为“真实”的历史材料和场景,另一方面则竭力摆脱几十年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掌控和笼罩,走近或写出一种更为“真实”的妇女运动史。

有意思的是,1980年代的重新起步依然主要或者说首先在文学领域内,至少在中国大陆情况是如此。虽然与1930年代不同,绝大部分的著述不是以文学史的形式面世,但对“五四”以来的女性写作传统的建构,对女性写作特色或风格的归类等等,都表达了一种要重新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定位的愿望。

中国近现代女性史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是极为边缘、极不规范的,然而却又是崭新的,并有着很大的开拓空间。1980年代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及其他相关思潮和方法的译介和影响,女性史研究开始进入一种全新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局面,要全面而完整地描述这个领域的面貌是困难的,我们只能选择与本著所研究的课题与领域最为相近的一些成果作一综述,极有可能挂一漏万。

从学科上说,我们首先选择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的相关研究,其次是近年来某些历史研究(尤其是女性史)的研究成果;在地域上我们首先选择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学界,其次是美国和日本的汉学界。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孟悦和戴锦华写于1980年代末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此著主要以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所张扬的女性意识为立场,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写作进行了重读,鲜明的女性视角和立场不仅揭露和批判了以男性为中心传统的性别压迫形式,而且对女性写作及女作家的遭遇读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历史叙述的蕴含,它对那些文学史上早有评定的女性作家和她们的写作赋予了崭新而独特的意义。

其次,要专门提及的是夏晓虹的研究。从《晚清文人妇女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到《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十多年间夏晓虹一直“钩沉晚清女界史料、寻找失落的线索”^①,潜心于晚清妇女历史的研究,其中对上海“中国女学堂”的考述,对《女子世界》文本内

① 夏晓虹:《导言 重构晚清图景》,《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4页。

外的解读,对林纾和蔡元培等男性文人有关妇女论述的细读等等都体现了作者十余年的研究功力和心得。近年来她又发表了不少厚重的学术论文,例如:《何震的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论》、《〈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等,大有将晚清女性史研究引向全面纵深发展的气度。虽然,她的“著述历来以‘史’而不以‘论’见长”,“自称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所知甚少,只是关注转型期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①,但她将晚清报刊杂志作为整个研究的基础,以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社会事件为依据,以个案研究见长,不仅梳理了晚清男性文人关于妇女话题的种种叙述,同时也勾画了晚清社会的五光十色和生气盎然。以她自己的话说:这样“可以避免宏大叙事的疏漏,通过对史料的精细处理,逼真地展示晚清社会的某一现场,揭示出其间隐含的诸种文化动态”^②。且不论历史场景是否能够得到“复原”,而夏著的苦心在于打破一种曾经一统天下的历史观——晚清曾一度被描述成“凝固不变”、“了无生气”和“垂死没落”的形态,夏著在很大程度上与海外汉学界的一些女性史著作的立意相似,都是试图以更翔实的史料来勾勒出更加丰富复杂的历史场景。

1995年前后,因为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国的召开,有关妇女的出版物层出不穷,其中也有不少有关女性史的优秀之作,如罗苏文的《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与夏晓虹的著作相似,此书也以“史”见长,但它的时间跨度(1840—1930年代)则超出了晚清这一单一时段。作者用了不长的篇幅梳理了传统男权社会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由来,而将主要的笔墨放诸描述近代社会中女性地位和命运的变化,而且注意到都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农妇与女工、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等等不同地域和不同阶层的妇女的差异性。由于作者的历史学知识背景,因而使得这部专著在史料的援引以及论述方面显得厚重而有说服力。

进入1980—1990年代,台湾女性史研究取得了稳步的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问世。至今该刊已走过了近二十年的路程,虽然它的“产量”不多(每年出版一期,每期发表论文约十篇左右),但这份刊物不仅打破了以往意识形态的禁锢,而且在作者队伍、论文的语言文字方面都相当国际化——除了台湾本土的作者,大部分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学界。2004年该刊推出了《“妇女杂志”研究专号》,对1915—1931年历时十七年的《妇女杂志》

① 见陈平原为《晚清文人妇女观》所写的序。

②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5页。

进行了多角度的评述和研究,这些论文对本著进行《妇女杂志》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我们在以后的篇章中还将提及。

美国汉学界近年来在中国女性史研究方面有着较为显著的长进。在美国学界,“社会性别关系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成为研究分析的一个领域”^①,虽然处于完全不同的学术背景和氛围之中,但美国汉学界的女性史研究却也不能不受中国大陆的影响,它正式起步于 1990 年代,其中被称为“海外中国妇女史开山之作”的伊沛霞(Patricia Ebrey)所著《内闾: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英文版出版于 1993 年,第二年高彦颐(Dorothy Ko)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英文本出版,1997 年又有三部英文版的中国女性史著作问世:贺萧(Gail B. Hershatter)《危险的愉悦:20 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曼素恩(Susan Mann)《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以及白馥兰(Francesca Bray)《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这五部著作已在最近几年中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女性系列”而被翻译成中文得以出版。虽然这五部女性史专著所研究的历史时段及对象不尽相同,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或相近的基本出发点,即对以往几十年、甚至近百年历史研究将前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勾勒成一种完全被动的性别群体提出质疑,从事宋代女性史研究的伊沛霞指出:

一般性地描写“妇女在传统中国的位置”失之于简单化,那样做实质上已经暗示妇女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历史以外,她们的生活不受文化、社会、经济变动的影 响。把妇女首先表现为受害者,这种做法经常困扰着我,因为它似乎贬低了她们。^②

而提出“盛清时期”这一概念的曼素恩则认为:

回顾清代,有一种采取 20 世纪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们居高临下立场的观点将其和明代一起统统归结为“封建”或“传统”的时期,在那时中国女性是儒家式家长制下的受压迫对象。在 19 世纪后期,中国的改革者和外国的传教士简单地将女性裹脚和缺乏教育这两点提出来,当作明清时期中国落后的特征。自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这些批评者更认为开展女子教育、反对女子缠足是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具有重要意义

① [美]曼素恩(Susan Mann):《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 月,4 页。

② [美]伊沛霞:《内闾·自序》,胡志宏译。

的第一步。根据他们的逻辑,晚期的中华帝国再一次证实了黑格尔的预言:这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文明,是一个不会变革的社会,只有引进西方思想,才能将其领入现代的民族国家之路。这种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的持续多年的论调,现在会因我们对明清时代社会性别关系的新理解而破除。明清时期远远不是所谓女性受到绵延不断的压迫的时代,事实上,这是长达数个世纪的一个动态的、多样化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导致了社会性别关系的深刻变化,这就要求我们采用新的分析方法。^①

研究20世纪上海娼妓问题的贺萧注意到: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高等妓女在被描述的话语中“体现了圆熟的文雅情致,成了温文尔雅的最高权威”,各类书写往往“大力赞叹美貌的名妓,描写往往含有刺激性的细节,尽情渲染她们与城里阔佬权势人物之间罗曼蒂克的纠结”。然而,“在二三十年代,娼妓被广泛地表述为社会问题的化身,妓女代表受践踏、妨害治安,代表危险。改革者经常斥责娼妓业剥削妇女,是国家的耻辱,甚至就是中国国力单薄的关键问题之一……”在这套话语体系中“将卖淫、现代性和国家三者联系起来”。^②贺萧所说的娼妓话题从晚清到“五四”的变迁体现了近代中国妇女观形成的一个侧面,她还指出:“我们要做的不是寻觅‘已然在那儿’的过去,而是寻找历史记载的对象、记载历史的人和我们自己这三方面互相之间游移不定的关系。”^③贺萧和曼素恩实际上都涉及了中国女性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虽然她们各自所从事的对象不同——贺萧研究的是20世纪的妓女,而曼素恩的研究对象则是“盛清”的女性写作,但她们同样强调要改变以往那种高度概括和抽象的历史研究方法,要面对动态的、多层面的、多样化的女性生存状态。

高彦颐可能是表述最为犀利的一位,她研究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的专著索性以“从‘五四’妇女史观再出发”为绪论的题目,对中国近代以来将女性的受压迫、受欺凌的形象作为中华民族本身的象征这一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封建的、父权的、压迫的‘中国传统’是一项非历史的发明,它是三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罕见合流的结果,这三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革命和西方女权主义学说”^④。她接着指出:

① [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威译,7—8页。

② [美]贺萧(Gail B. Hershatter):《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9页,418页。

③ 同上,14页。

④ [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3页。